



### 再论儒家伦理的普世化问题(蔡德贵)

(2005-5-12 17:02:21)

作者：蔡德贵

#### 三、儒家伦理在东方世界取得的成绩

儒学传到韩国、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经过在这些国家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与中国儒家文化略有不同东方儒学。对这些国家的儒学，澳大利亚资深外交家李瑞智和黎华伦合著的《儒学的复兴》把它和中国的儒学进行了对比以后，对中国以外的东方各国的儒家思想的特征进行了归纳，认为主要有十条：

- 1、强调人对社会的义务甚于权利，以及相互制约的压力以保证所有成员都在这一义务网络内受到约束并且分担责任和分享报偿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
- 2、强调人治或德治，而非法治，这可以保证在社会所能达到的和谐和内聚力；并且强调礼仪的重要，肯定竞争是在一种礼貌的规范内进行。
- 3、强调严格的竞争教育，这给受教育的人灌输和立下一种优越标准，把国家的官职及其他权力授给经过考核成绩优越者。严格的考核是确保能始终保持高水准的唯一有效办法。
- 4、强调过去和现在必须联系起来，养成一种敏锐意识，促进对历史时代和获得主要体制及有关成就作出长期的承担，与西方强调短期的“底线”和“成本效用”形成鲜明的对照。
- 5、认为人类群体的价值观和秩序是有重大意义，并非单只为追求物质的享有和累积罢了，其愿望是最终把经济权力授给非商业性质，但对商业有实际贡献的人员。
- 6、高度重视逻辑与合理性，由一种需要直观和感情牵制的强烈意识加以平衡，并以某些方式由儒家和道家的互补精神传统加以反映。
- 7、敏锐意识到现实的变化性质以及两极对立的互补而非对抗的需要，分别由《易经》和阴阳五行说加以反映。
- 8、对商业、工艺和科学持有一种独特的观念，认为在“市场推动”革新和“环境”考虑之间应该存在一种健康的紧张关系。对科学上的“突破”较不重视，但对各种工艺的“熔合”却极为注意，例如机器人，以便更好地为群体利益服务。
- 9、对体制的功利主义和革新精神具有一种本能，以便在面对各种问题时作出强烈反应，同时，表现出统治社会的官员以一种在非儒家环境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方式行使权力和完成任务。
- 10、避免同西化和个人主义攀上关系，以免带来“精神污染”问题，这种“精神污染”几乎被看作一种罪行，因为它会削弱大于个人的群体和国家的力量。（第40—41页）

东方伦理已经发挥了作用：日本的《论语》加算盘、韩国的忠孝、新加坡的伦理教育运动、马来西亚的“思想兴革运

动”，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中国传统文化有超越时空的特性。其影响是没有国界限制的。

日本作为“四小龙”之一，其经济腾飞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极大关注，有学者把日本经济腾飞的原因归之于儒家伦理。也有学者认为，儒家伦理对日本的经济的发展既没有促进，也没有延缓经济的发展。但是，儒学在日本经过企业家和学者们的努力，从儒家伦理中提炼出一种道德经济合一论，确实对日本的企业管理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二战后，日本企业特别重视诚信的原则，而且把诚信原则作为企业的生命，致使日本企业在国际商界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赢得了信誉，扩大了市场，获得了利润。

韩国政府从1982年开始，将传统价值观中的优秀部分挖掘出来，注意克服国民的懒散习惯、封闭自守、精神空虚、缺乏创造力等不良素质，净化民族精神，通过教育改革，力求培养出新的韩国人：健康的韩国人——强健的体魄、刚强的意志、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情感；独立的韩国人——自信、自主决策力、进取开拓精神、强烈的民族意识；创造的韩国人——基本的学习技能、科学研究能力、理智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的思维；道德的韩国人——正确的价值观、人类的认同感、优秀的公民意识、关心他人的精神。韩国人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已经说明这种做法已经唤起了国民的高度自觉，他们把自己家的首饰等物贡献给国家，以帮助国家度过金融危机。这正是家国一体的价值观的现代体现。韩国政府的做法，是否值得儒学文化圈其他国家效法呢？如果东方儒学文化圈国家都能把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进行现代转换，那么，东方文化确实会再现辉煌。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第 4 页\]](#)

[\[第 5 页\]](#)

[\[第 6 页\]](#)

[\[关闭窗口\]](#)